

战后德国与波兰有关历史教科书的对话

[日]宫崎悠

本文主要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西德与波兰之间有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所作的努力。^①在现在的德国和波兰,历史教育的地位怎样呢?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否仅仅只是为了加强对本国历史的认识?本文以欧洲为例,探讨是否存在不被国家的框架束缚,并从多角度探讨历史教育问题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在欧洲各国中要着眼德国-波兰的对话来进行探讨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西德一直通过国际性的讨论与合作,致力于改进历史教科书。西德的努力在日本也早就受到关注。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况与德国相似,^②特别是现在在反思日本和周边各国关系恶化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德国与日本情况类似,却在历史教育问题上通过与日本不同的努力,使其在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正是德国政策受到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另外,从波兰方面来看这个问题。自18世纪以来,波兰经历了邻国的多次侵略与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首都华沙被严重毁坏。纳粹德国占领波兰

* [日]宫崎悠:日本成蹊大学副教授。

① 这实际上涉及国际历史教科书的对话问题,活动的开始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结束后至今,各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目标、主体、围绕着历史教科书问题进行了对话。所以很难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在这里暂且(将世界各地的多样性及各个时期都包括在内)把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定义为以下活动:“召开有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者、教师,有时候也包括教科书出版社、政府代表等参加的国际会议,通过互相指出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其他教材中存在的本国中心主义的叙述,达到对历史客观公正的理解。以这些为目的的活动我们称之为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参见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中公新書、1998年、13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活动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教科书中叙述的历史理解的改进,把历史教育整体地从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使之更和平,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不闭塞而更加开放。

② 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3頁。

③ 与德国相比,日本被指出“对过去认识得不彻底”,进而被指出,在这一点上,日本跟奥地利有相似之处。参见近藤孝弘『歴史教育と教科書:ドイツ、オーストリア、そして日本』岩波書店、2001年、6頁。

后,在波兰建立了灭绝集中营。很多政治犯、犹太人俘虏都死在波兰。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由基础设施被破坏而导致的战后迟迟不能复兴,而且很多年轻人失去生命,地方自治团体不复存在,这些都给人们的记忆留下了巨大的负面遗产。也因为这样,一方面,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叙述德国与波兰的关系受到瞩目;另一方面,德国的观点及如何接受这些观点,对波兰学者们来说成了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方的德国成为战败国,被占领的波兰获得独立。曾经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两个国家,如果不努力超越过去的话就不能在对等的情况下相互理解。^①“超越过去”现在依然是个难题,但从30多年以前就开始的德国-波兰在教科书问题上的对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笔者将按照如下的顺序进行分析。首先,看一下德国的历史教育现状;其次,探讨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话失败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时期,德国和波兰两国之间进行了怎样的对话。

一

现在国家对于本国历史进行美化的现象,不仅限于日本,在美国、欧洲等国也都存在。这其中,德国被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地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的一个国家。当然,冷战时期的整个国际大环境使得西德不得不对纳粹的过去进行批判。尽管是在外在压力的迫使下,但“对过去的超越”所作的努力,的确使西德恢复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重新获得信赖。1985年,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40周年大会上,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说中说,“改变过去或者把过去的事情当作没有发生都是不可能的。不正视过去的人对现在也是盲目的”。^②后来,魏茨泽克提起这次纪念演说,他回忆道,“一定要诚实地不加任何美化地直面过去……德国人必须记住这一点”。对于演说后在德国展开的热烈讨论,他给予肯定说,“因为我们德国人重新开始努力面对过去,外国也开始积极地向我们学习”。^③

纳粹犯下的罪行,即使在战争中无法确认,也都在战后逐渐地得以证实。^④以

① 西川正雄『自国史を越えた歴史教育』三省堂、1992年、2頁。

② リヒャルト・フォン・ヴァイツゼッカー『荒野の40年』永井清彦訳、岩波ブックレット、2009年。

③ リヒャルト・フォン・ヴァイツゼッカー『ヴァイツゼッカー ドイツ統一への道』永井清彦訳、岩波書店、2010年、126頁。

④ 比如:克劳德·朗兹曼导演的电影《浩劫》(《Shoa》)的证言人杨·卡鲁斯基(Jan Karski, 本名 Jan Kozielski, 1914—2000),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犹太运动家的协助下,潜入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贝尔赛克强制收容所进行调查。他做这些调查是为了向英美政治家、教会有关人士宣传犹太人被根绝的现状。但是由于是在战时,没有得到太大反响。参见ヤン・カルスキ『私はホロコーストを見た:黙殺された世紀の証言 1939—43(上)』吉田恒雄訳、白水社、2012年。

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代表的劳动营/灭绝营等进行大量杀戮,给许多人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德国本着不再重蹈覆辙为目标,持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赔偿”。具体进行了哪些赔偿,我们先从教育领域来看。战后,为了正视纳粹犯下的罪行,从过去吸取教训,德国开展了被称作“超越过去”的一系列努力。这种姿态也反应在德国的历史教育问题上,^①也就是说,将本国的过去传授给下一代,这在战后 60 多年的今天仍被认为是历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学积极地在短期留学项目中派学生去波兰留学,这些学生无偿教波兰小学生英语、德语。很多德国学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积极接收愿意长期从事志愿者活动的学生。^② 也有的企业与教育界有着同样积极的态度,例如,大众汽车公司于 1987 年开始就组织职业技校的学生们参观访问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它们让波兰的技术/商业学校的学生团体与德国的学生团体同行(2011 年德国 1200 人参加、波兰有 700 多人参加)。^③ 它们认为,正是通过这种国际交流的场合,年轻人才能在了解德国的基础上,有机会思考关于战争的责任问题。

德国的《中等教育学习指导纲要》(1994 年版)规定:“我们经历了残忍的、非人道的体制下的历史阶段,得出了必须建立民主的人权国家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将从这个角度致力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主义的维持和发展。”也就是德国在承认自己是加害者的基础上,希望从战争的历史中学会怎样维护和平。进而,《中等教育学习指导纲要》要求,作为学习历史的方法,要着眼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要求学校采取能够体验历史的授课方式,并重视去集中营遗址这些历史现场参观等直面现实的活动。^④ 德国的历史教育认为“与过去的对话”是思考和平必不可少的要素。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破坏,使得人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渴望和平,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加大了渴望和平的需求。当时,欧洲在改进历史教科书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现实中的美国、英国、法国等重要国家持消极态度,使得这些活动并未收到很大成效。当时有批判指出:各大国关于教育的权限属于各个国家

① 川喜多敦子『ドイツの歴史教育』白水社、2005 年。

② 参见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网站, http://en.auschwitz.org/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3&Itemid=12&limit=1&limitstart=1, 2013-08-20。

③ 关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的志愿者活动的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站, http://en.auschwitz.org/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29&Itemid=8

④ 田村光彰、村上和光、岩淵正明編『現代ドイツの社会・文化を知るための48章』明石書店、2003 年、116—117 頁。

(即各国与教育有关的机构人员),所以,国际联盟的活动属于干涉内政。^①

即便如此,改进教科书的必要性在多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共识。在这一时期,有几项活动获得实施。比如,1921年,在国联的第二次大会上,成立了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i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主要是为了反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知识分子过于赞美民族,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疯长。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人们增强了和平意识。在全世界反战意识高涨的环境下,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集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1937年,发表了《关于历史教育的宣言》,该宣言提出,政府与教科书撰写者应该为促进各国民间的相互理解,用尽可能多的篇幅对外国的历史进行叙述。

虽然发表了这个宣言,但各大国再次以教育是本国的自主权为由加以反对。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联的活动没有收到显著成果,此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由于战败,德国被美国、英国、法国、苏联4国占领。在西部的美、英、法军占领区,军政府开始了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国际对话。这是作为非纳粹化一环的“再教育”政策。美英法的根本态度并不一致,但在“坚决反对纳粹主义与德国民主化是密切相关”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占领军请德国历史学家撰写新的教科书,除了向其提供打字机、纸张等物质援助外,还向其提供最新的学术著作。这些学术支援后来超越了图书赠与本身,战争以来一直中断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由此重新开始。占领军中也有很多学者,他们与德国学者一起作为先驱,为本国历史学会、教师团体与德国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开辟了道路,从此,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开始了。^② 如此,战后德国在占领军的协助下再次开始了历史教科书对话。

活跃在这个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埃克特向原为纳粹青年团的学生们讲起了历史学。埃克特认为,普及不被纳粹主义扭曲的国际通用的历史认识是德国的课题。埃克特靠撰写教师手册得来的稿酬,建立了国际教科书研究所(Georg-Eckert-Institut, 现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前身)。此后,该研究所迅速开展了与西方各国(特别是法国)之间的双边对话。

在德国与占领国的关系(对法关系等)取得较大进展时,德国和波兰之间,处于完全相反的冷淡关系。即便如此,为了实现历史教科书对话,历史教师们仍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比如,在德国的中等教育历史教员爱诺·玛雅等人的努力下,冷战中的西德和波兰开始了对话。

① 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

② 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中公新書、1998年、19—20頁。

玛雅战后在德国北部的学校教德语和地理。当时,占领军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伤透脑筋,历史教育尚处于被禁止状态。即使在解禁以后,学生和老师们也不知该怎样对待在重大变故后的“历史”这门学科,感到非常困惑。

在此情况下,玛雅作为历史教师决定自己编写全部教材,既有教科书的内容不完整,质量不够高。更有甚者,讲授与波兰关系的“适当的”教材完全没有。于是,她借助德国的波兰史学者、逃亡苏格兰的波兰历史学家的帮助,用了约一年时间找出了西德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波兰史的叙述上的问题。

1950年代,教育状况迫切需要新编写的教科书,1960年代中期,人们再次强烈感到和解的必要性。首先,1965年统管德国基督教会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了《难民的地位与对东方诸国德国国民的关系备忘录》,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文件。其中有两点新内容:(1)为了两国民间的和解,承认德国人对波兰犯下的重大错误非常必要;(2)为确保波兰国民的生活提供足够的空间。

有了这样的准备工作,1970年秋,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上,正式约定了国际教科书对话的开始时间。随后,西德方面的11名委员拜访了华沙的波兰科学研究所,她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现在,由两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内委员会组成的共同教科书委员会一直没有中断工作。德国-波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在华沙和布伦斯维克每隔年一次举行会议,早在1976年4月,在布伦斯维克会议上,发表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其中包括以下26项内容:古代/中世纪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中世纪欧洲诸国的形成、中世纪后期的帝国和德国-波兰关系、波兰史初期(10—13世纪)的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中世纪东欧中部的德国移民、波兰和德国骑士团、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德国与波兰的宗教文化关系、启蒙时代的波兰、普鲁士和瓜分波兰、波兰国民为自由独立之斗争、波兰自由斗争之对德国的影响、工业化、德意志帝国的波兰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波兰关系、十月革命和波兰、中欧各国的瓦解和德国-波兰关系、国境问题、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波兰关系、1933—1939年的德国-波兰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占领政策和抵抗、领土变更、居民移动问题、复兴问题、对过去的超越、国际环境、正常化的道路等。^① 这些内容显示,当今两国间的历史理解问题并不只是在纳粹时代发生的。其中还包括很多关于瓜分波兰的近代史,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史(波兰-德国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成员不仅有现代史学者,也有一些专门研究中世近世的德国-波兰关系的历史学者)。比如,第20项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需要充分叙述纳粹的占领政策,以及其对波兰国民带来的后果。应该明确的是,希特勒政权的政策,不仅仅是对波兰这个国家的抹杀,他还要根绝波兰的知识

① 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61—62頁。

分子和文化,对波兰国民进行压抑,将波兰殖民地化。应该对波兰军队的战斗,波兰抵抗运动特别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叛乱和华沙起义给予高度评价。波兰的教科书中将德国人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这是值得高兴的。期待德国的抵抗运动也应该和波兰的抵抗运动一样,作为欧洲抵抗运动的一环得以更详细的叙述。”^①这个建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德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对纳粹在波兰实行的残酷占领政策进行正确地描述;第二,要对波兰抵抗运动的意义做出正当评价。关于第一点,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即使在新的西德教科书中也没有对战争中德国对波兰人的所作行为进行充分叙述。建议要求现在的德国人重新认识过去德国人的行为。第二点要求是,对战争中波兰人进行的抵抗运动做出正当评价。如果只盯着自己本国的过去看,这种要求是提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只在本国范围努力的话,甚至不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对于加害者来说,反省自己的历史其实相对容易,真正难的应该是站在被害者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从被害者的角度来理解历史时,承认自己的加害事实是最起码的,但仅仅这一点还是不够。事实上,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非常困难。即使对过去抱诚实的态度也难免会有本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国际对话是有特别意义的,第二点向我们展示了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的本质。德国-波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最近进行的项目有:2012年5月,德国和波兰的学者执笔撰写的“关于对教科书内容及形式的建议”,以《埃克特专家评价》(*Eckert Expertise*)为题,以系列形式出版。^②

以上简单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波兰的对话情况。可以说,西德-波兰国际教科书改进问题的社会反响不仅仅停留在两国国内,在其他地区也被多次提及,在世界上也成为了著名案例。但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这样的活动很少见。所以,这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改进的典型例子,也许应该说是特殊例子。

实际上,关于德国-波兰进行的活动,越研究越会发现德国历史教育问题上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课题。还不能单纯地褒奖德国的现状。

但是,在反思日本在思想与行动上哪里欠缺的时候,它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比如说,是否可能超越国家这个框架来理解历史,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德国和波兰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在超越过去,与周边各国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上,欧洲的这些成功与失败的事例都非常值得学习。

(李静和译)

① 参见西川正雄『自国史を越えた歴史教育』三省堂、1992年、179頁。

② 参见德国教育部HP, <http://www.gei.de/en/research/europe-narratives-images-spaces/europe-and-the-national-factor/german-polish-textbook-commission.html>, 2013-08-20。